

西夏法典

——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

(第1—7章)

〔苏〕Е·И·克恰诺夫 俄译

李仲三 汉译

罗矛昆 校订

宁夏人民出版社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1169)
КНИГА 2

本书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本译出

西 夏 法 典

——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7章）

（苏）Е·И·克恰诺夫 俄译 李仲三 汉译 罗矛昆 校订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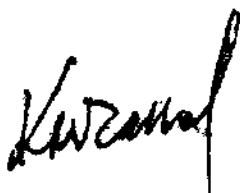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ISBN 7—227—00443—0/K·58

定价：3.80元

汉译本序言

Е. И.



敬爱的中国读者，宁夏人民出版社请我为12世纪《西夏法典》及对其研究的汉译本写几句话。坦诚地说，我为进行这一研究，耗费近20年的时光，还不算一些已经发表或尚未发表的单篇著述。

你们都知道，早在中国宋朝时期曾有一个西夏国，她是由藏缅语族的民族所建，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被称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称他们为唐古特人。该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唐古特人于公元1036年制定并使用具有汉字书写特点的独特文字。西夏国连同其人民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不仅被蒙古人所征服，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因为成吉思汗约死于其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城下，这就使她遭到了征服者更加残酷的镇压。

唐古特国的疆域于是变成了元帝国的西夏路，而后成为宁夏省。这虽然是其固有的称谓，但保留在这一名称中的第二个夏字，留下对过去大夏国的记忆。西夏国居民杂处，其基本成分是党项人、汉人、藏人、回纥人。蒙古征服者平服其领土后，该地又增添蒙古人和来自马腊温纳戈腊（МАРАВИННА-ГРА，今苏联中亚细亚地区）的移民。汉语是这里不同种族居

民相互交往的语言，而宗教则是伊斯兰教。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原因，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究竟伊斯兰教在何时成了元帝国所属西夏路居民（虽不是全部，只少也是大部）的宗教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会成为这一地域的主导宗教？有必要指出，西域移民中多来自当时信仰伊斯兰教传统的国家。我手头没有关于该地区移民及其人数的足够资料，但外来人的数量显然要大大少于当地信奉佛教的党项人、汉人、藏人和回纥人等居民。需要有一种迫使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的政治力量，即灌输伊斯兰教的权力。这种力量已经可以觉察到，当地的蒙古人政权就是使不同种不同文的西夏路当地居民变成操汉语穆斯林的一种力量。这就是西夏路执政的汗·阿难答（ХАН АНАНЪДА）。他乃元朝著名皇帝忽必烈之孙。阿难答的父亲忙哥剌（МАГ ЭЛА）是忽必烈第三个儿子，于公元1271年获得安西王的封号。因忙哥剌原生的几个儿子先后夭折，阿难答降生时，父亲就将他送给东土耳其斯坦一位穆斯林觐黑帖尔·哈散·阿黑塔赤（МЕХТАР·ХАСАН·АХТАЧИ）抚育。如著名的蒙古史学家拉斯特·金（РАШИД-АД-ДИН）所记：“这个人的妻子名叫祖来哈，把他奶大，因此本速蛮的信仰在他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背诵过《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得很好”。①

公元1279年阿难答继承了安西王的王位和唐兀惕地区（前译西夏路。——译者）执政职务。新执政者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②于是，阿难答“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了割礼，并且使大部分蒙古军队皈依了伊斯兰教”，③有人向忽必烈告了密，阿难答

①（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1986年商务版，279页。

②③同上书，379—380页。

被拘禁起来。因为忽必烈正为保其皇位而战斗，需用阿难答的军队，阿难答才被释放。忽必烈听从其妻阔阔真哈敦（KOK—ЧИН—ХАТУН）的劝告而释放了阿难答，决定不去理会“唐兀惕地区所有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并对此执迷”，①听任蒙古人自愿皈依异教，让他选择自己的信仰”。②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汗（元成宗）本人对伊斯兰教也有好感，因此阿难答“更为关心伊斯兰教”。③阿难答在铁穆耳在位时期始终不渝积极地培植伊斯兰教。但他的结局很不幸。铁穆耳御极之后，武宗即位，阿难答被卷进公元1307年蒙古亲王之间的内讧之中，“被赐死”。④非常遗憾，作为叛逆者和国事犯的阿难答在《元史》中并未留有其传记。

他传播伊斯兰教活动是那样的积极，以致他的同时代人拉施特·金写道：“从阿难答及其军队的状况可以作出结论，最近伊斯兰教的事业就将在该境中臻于完善，并按《古兰经》的名言，‘他们将成群加入安拉的教，’他们将成群地加入，〔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将成为虔信和一神教徒、无瑕信仰之木速蛮”。⑤伟大史学家论断正确。不论他们是否成群地加入了，但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他们子孙的子孙在该境内却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木速蛮（穆斯林）统一体，他们曾经是操汉语的元帝国土民。到了明代，这部分原帝国的臣民已经完全汉化，并且成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按族源来看，这一混合体中原居于西夏境内的党项一支的比重较大，然后才是其他民族。因此我认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穆斯林居民与白高大夏国是有联系的。

①②③⑤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1988年商务版，381页。

④《元史》22卷，108卷。

穆斯林的区域性似乎是杰出的西夏文化和文献迅速消失的原因之一。尽管西夏文字在佛教界、在忽必烈宫殿中、在汉族地区仍长时间流行，但使用这些文字的那部分党项人下落不明，他们的踪迹继续到16世纪。在现今武威市耸立着用汉夏文字镌刻的石碑，铭记着对此地著名佛教浮图时时修葺的盛况。另外，有大量的西夏文铸钱。但所有这一切，后来已不被注意，被遗忘了，它们几乎未被中国清代作者们提起过（尽管清王朝对非契丹族人民的历史很感兴趣），欧洲的作者们早在其信札中表述过对党项人形成的疑点。这里我不愿考证党项人的种族形成历史来烦恼读者，仅略提及东方学中研究有关西夏的正确方面。只能指出，在利用俄国中亚细亚学者П·К·柯兹洛夫在废城黑城（蒙古语哈拉浩特）找到、从蒙古人处得来的资料之后的一丝断线，这批资料真称得上是手写本和刊印本的西夏文与汉文书籍的图书馆。我想着重指出，由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和俄国东亚学会联合组织的对清代中国领土的探险是经过清政府同意进行的，运出掘得的书籍也是经过同意并在中国的地方蒙古政府协助下进行的，地方政府向柯兹洛夫提供了必要的运书用箱子。在清代中国对这批文物的长远价值尚无起码理解的情况下，事情也就完结了。因此，公正地说，谈不上是从中国窃掘（如前不久中国某刊物所云）这批资料，相反，是他们对科学的挽救。

刊印的法典就是从黑城找到的西夏书籍中的一种。我希望译成汉语的不仅是其原文部分，也应包括我的研究部分，因为在这部分中我并非重复论及法典，也论及对其研究的历史。这两部分我已经全部写完并已刊印。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即虽然可能提供给读者的是西夏文法典的一部不完善的译文，但它应被视为过去或现在全世界学术界为数不多的一批研究西夏学

专家们的功绩。值得我特别提到的是中国罗氏兄弟——罗福苕、罗福成二先生、王静如教授、石滨纯太郎教授、A·И·龙果夫教授、聂历山教授。是这些人为当今的西夏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今的西夏学界也包括一支为数不少的能力很强的中国西夏学者的队伍。请相信，我了解并珍重他们著述颇丰的劳动。

30年来，我和西夏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我毫无遗憾。如我在俄文版前言所写，可能无人比我更知自己译文中的缺点和不足。请允许我重申：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它们二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捷径是没有的。至关重要的是为广大研究界提供西夏原文，对译文中难免的错误，他们可以批评、斧正。为了科学的发展，首先应深入研究具体材料，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修正认识事物的一般观点。

我衷心希望，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初次接触，能成为良好的开端，还有许多西夏文的其他写本文献，也是很重要的，有兴趣在银川出版，因为那里是这些文献产生并得以见到天日的故都，那里有广大对了解自己历史怀有极大兴趣的读者，他们在阅读中可以找到写于七百多年以前很亲切和熟悉的东西：当时既写到了滔滔奔流的黄河，也写到了巍巍高耸的贺兰山和阿拉善优美的驼群。我很愿意与银川的同行们进行具体合作，以合乎时代需要的科研成果奉献给两国，奉献给两个都在艰苦顽强地建设新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友好邻邦。

1988年11月9日于列宁格勒

序 言

王静如

戴锡章写完《西夏纪》后感慨万端，喟然而叹：“夫西夏声明文物，诚能与宋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乃辽、金有史，而西夏无史，何也？”戴氏“颇怪当时史臣，不为建议，勒成专书，仅附鹿裘、辽、金三史以传”。此言盖误。

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灭西夏后，西夏文物典籍毁坏殆尽。加之西夏地处边陲，闭关锁国，成为丝绸路上的一个神秘王国，使中原学者对它的了解甚微。西夏灭亡后，元人修史不能不受其影响。即或幸存下来的西夏典籍，史官未必懂得，只好在宋、辽、金三史内附之以传，敷衍塞责。

世传西夏人罗世昌罢官后居家，曾为夏国“谱叙世系”。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也许此书为仁孝命王金等掌史事纂修的《李氏实录》。元脱脱修《宋史》时亦得《夏国枢要》等书，虽今世人未见。公元1908年，俄国人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即黑水城，又称哈拉浩特）发掘出大批西夏文献，从已公布的这批文献目录上，也未见以上诸书。

这批珍贵的文献对研究西夏历史、典章制度、政治、经

济、文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者，唯西夏法典。其中保存较全、数量最多者即《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全书计20章2600多面（仅缺第16章），是中世纪远东地区保存下来最详备的一部法典。它不仅对研究我国法制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甚至对研究东方各国的法制都有参考价值。苏联著名西夏学者克恰诺夫教授潜心研究这部法典近二十个春秋，写出百万字的四卷巨著，已在苏联陆续出版，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到这部书的第二卷后，立即组织人力翻译，申报经费，并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计划。喜讯传来，令人兴奋。

宁夏是西夏的发祥地，1982年我有幸赴宁考察，那里遗留下了丰富的西夏文物古迹：驰名中外的西夏陵园，被誉为“中国的金字塔”；西夏第二代皇帝谅祚为其母没藏氏修建的承天寺塔，如今依然屹立在西夏故都——银川市中心。对西夏的研究，自然成为宁夏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和政府对西夏研究十分重视，列为重点研究学科，予以大力支持。早在七十年代初，政府拨巨款发掘西夏陵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辨清了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寿陵。1981年，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和宁夏历史学会发起，在银川召开了第一次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它为西夏研究作出了成绩，令人欣慰。

回忆三十年代初，我有幸从事西夏研究，那时我仅20来岁，毅然承担了攻克西夏文字这一任务。短短几年，我写出了《西夏研究》1—3辑，使我荣获法国东方儒莲奖，曾为国争光。不幸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使这门新兴的学科被夭折了，直到六十年代初，这一学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新生。1962年，我开始带西夏学研究生，现在已培养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已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记得苏联西夏学先驱聂历山教授在世时，曾在《哈拉浩特

西夏文献出版计划》里谈道：“刊布柯兹洛夫所获文献，乃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科学事业。哈拉浩特出土的材料，至今几乎尚未能供学术界使用。”他感到很遗憾。他认为：“斯坦因从哈拉浩特取走的文物，同苏联科学院和爱密塔什博物馆拥有的藏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藏品在数量的丰富和内容的多样性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遗憾的是这些从我国发掘出土的西夏文物，至今仍在苏联珍藏，中国学者可望而不可及。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五十年前苏联学者深望中国学者参加的遗愿，今天定会实现。据悉，宁夏社会科学院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已在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我虽耄耋之年，我衷心希望中苏两国西夏学者携起手来，为使尽快共同整理出版这批稀世文献，以答学术界的殷切期望。我如有幸参与，我会感到十分荣幸。

宁夏的西夏学者首次翻译克恰诺夫教授的专著，并获得政府资助，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中苏两国西夏学者合作的良好开端。我愿为此书中译本撰序，寄托我对这一学科的希望，义不容辞。是为序。

序 言

李 范 文

西夏立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如按《宋史》所载：“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这要比北宋和南宋加起来还多27年。元昊建国时所辖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雄视一方。最强盛时，其势力已扩张到今青海的西宁、新疆的哈密一带。在我国历史上谱下了光辉的一页。

遗憾的是这个伟大的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几乎随着国家的覆灭而湮没。用西夏文刊印的佛经、镌刻的碑文，多年来象谜一样引人猜测，致使历代史家撰写的西夏史书很少引用第一手的西夏文资料。

1909年俄国探险队队长柯兹洛夫大佐在我国黑水城（哈拉浩特）发掘出土大批西夏文献。在对这批文献的整理中，伊凤阁首先著文介绍汉夏对音常用字手册《番汉合时掌中珠》，从此揭开了近代释读西夏文字之谜。三十年代初，苏联、我国和日本的西夏学者在西夏文字的释读、研究、译著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卓有成效者：苏联的聂斯克、伊凤阁、龙果夫，中国的罗福成、罗福颐、王静如，日本的石滨纯太郎，德国的本汉厥夫人、美国的劳弗尔等。1932—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王静如《西夏研究》1—3辑，荣获法

国东方儒莲奖。从此，西夏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使我国再无精力和财力来发展这一学科。在苏联，由于斯大林肃反运动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者聂斯克死于冤狱，柯兹洛夫从我国发掘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献被束之高阁，从此西夏学处于停顿状态。

1960年，赫鲁晓夫当政时，为聂斯克平了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把聂氏发表的论文及其备用的西夏文字典手稿影印出版，名曰《西夏语文学》，并于1962年授予列宁文学奖金。当代著名的苏联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继续整理编目这批西夏文献。据苏联公布整理结果，共计8090件，其中聂克斯整理登记955件（1—955号），龙果夫登记2720件（956—3675号），戈尔芭切娃登记173件（3676—3848号），克恰诺夫登记4242件（3849—8090号）。克氏一人整理登记的件数比三人整理之和还多494件，其殊勋可见一斑。

在这8090件文献中，绝大部分为佛经。世俗著作中，最重要的文献莫过于西夏法典，其中最完整的莫过于《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该法典共计20章（缺第16章）2600多页。克恰诺夫教授耗时近20年，将该法典的研究成果写成四卷本巨著：第一卷为研究专著，第二至四卷为法典译文。

西夏文笔画繁冗，世有绝学之称，对它的译释十分艰难。克氏以他多年来研究这一学科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用母语非凡的表达能力，与其说译释，毋宁说对每个西夏字的进一步研究。他的译文简炼、准确、易懂。由于西夏字有的字形酷似而字义全非，常使人发生阴差阳错，克氏译文之中免不了发生此种现象。例如，𐽳（酒）与𐽳（𦵏），克氏把𦵏（𦵏）误译作“酒”、把𦵏（𦵏）误为𦵏，译作“醉汉”。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应予谅解。译释这样典籍，往往要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克氏披荆斩棘功不可没。

这部书后附有西夏原文，为了使更多的读者在购买本书时不负担过重，我们略去了西夏文原件的复印，减去大量篇幅，使书价仅仅及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我们按原著全文译出，陆续出版。

这部书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翻译，自治区财政厅拨专款资助，宁夏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我国西夏学老前辈王静如教授及原著者克恰诺夫教授为汉译本写序，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译者说明

一、《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是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西夏法典。全书20章，1460条。原件随同其他西夏文物于1909年由И·К·科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古城（内蒙古额济纳旗哈拉浩特）掘走，今藏于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除少数损毁外，法典尚有78—80%被完好保存下来。

1987年，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苏联西夏研究者Е·И·克恰诺夫教授的专著《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全书分四册陆续刊行：第一册为克氏本人对法典的研究成果；第二册为法典1至7章的俄文译文，并附录所译的西夏文原文照片；第三、四册为法典8至20章的译文和刊布原文照片。

二、西夏法典是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重要资料，是汉籍史料无从获取的第一手文献，故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将这一珍贵文献翻译出版，其意义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先将俄文译本翻译出版，再翻译西夏原文文献。这样的好处是既能尽快使国内一般读者了解西夏法典的概貌和细节；又能给研究者提供足资比较的底本，使其有充足的时间斟酌、对照，将其西夏原文翻译得更加准确。我们认为，两种文本的翻译，不但并行不悖，简直是缺一不可的。

三、本书为俄译的第二册，却又是法典原文的首册。为不致引起混淆，我们改用按西夏册数标号：第一册标明“研究论

文”，第二册即本册，标明“第一至第七章译文”。这样，使读者一开始即能从头领略西夏法典的正文，方便适用。

四、本书既是依据俄译本翻译，译文自然忠实于俄文原著，除极少数官名、专名等查对西夏原文外，一般不作改动。俄译中的注释对中国读者参考价值不大，除少量保留外，大部分省略未译。保留的注释，均加俄译注，汉译的注释，加译者注，以示区别。

五、原书附录的西夏原文，因考虑到一般读者的程度和降低书本的售价，本书不再附录。

六、书中〔 〕内文字为克氏之语，均用黑体字排印，〔 〕内文字为西夏原文省略处，为克氏所加。

七、参加本书译校的，除了已署名者外，尚有李温、王希仁同志，他们参与了第六、七两章的部分翻译，李范文同志审阅、修改了译稿。

目 录

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一章

谋反（1—5条）	（3）
谋大逆（6—7条）	（7）
谋叛（8—12条）	（8）
恶逆（13—18条）	（10）
不道（19—24条）	（13）
大不恭（25—31条）	（19）
大不孝（32条）	（21）
不睦（33条）	（22）
不义（34—36条）	（22）
乱伦（37—39条）	（24）

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二章

八议〔有减免权者〕（40条）	（25）
亲属辈份（41条）	（27）
依官品断例（42—47条）	（29）
贿赂罪处律（48—53条）	（35）
老幼重疾犯罪减免断例（54—56条）	（38）
越上处律（57—62条）	（40）
烙印律（63—64条）	（42）
烙印格式（65—70条）	（42）